

魯迅文學的誕生

讀《吶喊·自序》

作為一種文體的回憶

我們今天閱讀《吶喊·自序》，在進入文本之前，我先簡單回溯一下昨天讀《破惡聲論》時涉及的文本形式問題。《破惡聲論》的文本形式內含了一種自我的顛覆性：它採用了一種既不同於文言也不同于白話的古文形式。從形式上看，這是一個與排滿的民族主義革命有着密切關聯的民族主義文本。革命，表現在它對文言及其體制的拒絕；民族主義，表現在它試圖以語言形式追溯民族的文化之根，同時拒絕歐風美雨浸染下的白話。但文本的內容之一，是批判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潮，文本的後半部分集中批評所謂「獸性愛國」和「崇侵略」的志士。他也批評了這個浪潮中的啟蒙思想，將那些啟蒙者看作「偽士」，與此相對應，他強調「迷信」的積極意義。文本的內容與形式之間構成了一種顛覆性的關係，

但也因此，這個顛覆性不是一個簡單的否定。魯迅對民族主義的否定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通過這一否定，提出「民族革命的真正使命到底是甚麼」這樣一個問題；也正是通過這個批判，他成為一個比同時期的人更為深刻的民族主義者。他對啟蒙的批判也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通過批判重建思想的地基，賦予這個思想的革命以真實的內容。他批判世界主義，否定無政府主義學說，但通過這個批判否定，他將自己轉化為一個比所有人都更深沉的國際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這個自我顛覆性成為我們接近這個文本的契機。魯迅的寫作動力就來源於這種自我顛覆。古文的形式是一種自覺的形式化。理解這個文本本身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特殊關係，也是理解其顛覆性的通道。要理解《破惡聲論》這個文本，就必須解讀其形式和內容之間的特殊張力。魯迅一生有過幾次重要的再出發的契機，1907、1908年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出發點或再出發點。就是在這個時刻，他突然展開了一套獨特的、區別於這個時代的主要潮流的思想。

他的第二次再出發的秘密，就埋藏在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文本之中。這是一篇與《破惡聲論》截然不同的文章，無論是語言形式，還是敘事風格。《破惡聲論》是一篇論文，有很鮮明的觀點，我剛才說它是一個從形

式到內容都具有自我顛覆性的文本，而《吶喊·自序》是一篇回憶性的散文，也用了序文的形式。與《破惡聲論》相比，這個文本看似平易了許多：前者以古文形式展開，我們需要從一系列深奧的觀念或語詞入手，逐層解開文章的論點及其複雜內涵；而後者以白話形式追憶往昔，交代他孕育和寫作《吶喊》、《彷徨》、《野草》並參與《新青年》的文化運動的動力和契機。構成這個追憶的是一系列的故事，一些獨特的語詞是鑲嵌於故事和故事中之人的感受之中的。在1907年到1908年期間，魯迅寫作的一系列文本，比如《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秘密隱藏在「心聲」、「內曜」、「人各有己」、「朕歸於我」、「英雄」、「個人」等等一系列觀念和語詞之中，發自於內的自覺和精神性就是通過這些觀念而成為作者論述的出發點。這些語詞建立了一個自我，即便這個自我是建立在無之上，它也構成了批評當時各種社會思潮的絕對前提。除了上面提及的「獸性愛國」的民族主義之外，作者對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觀念也給予尖銳的批判。當然，作者批評這些觀念，揭示其內外表裏之間的矛盾，並不同於單純的否定。例如，他批評民主，並不同於支持專制；他揭露平等，但不同於贊成等級制。恰恰相反，通過這個否定，他

自己變成一個反民主的民主主義者，反平等的平等主義者。這樣一來，他所謂民主和平等便隱含了與歐洲資產階級的民主和平等不同的內容。正是在這裏，他找到了介入啟蒙思潮的內在動力和契機。

在 1907–1908 年間，他比較多地受到西方的浪漫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他的文本糅合了經過章太炎闡發的國粹思想與尼采主義。1918 年，他發表《狂人日記》，從此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中的《吶喊》、《彷徨》時期。也就是在從辛亥革命前夕至參與《新青年》的文化運動這段時間裏，魯迅的寫作似乎暫停了，用他的話說，是以沉默或蟄伏的方式沉入「國民」中、回到「古代」去。他的早期論文有非常強的自我批判、對時代思潮的抵抗，但這種自我否定實際上是一個主體建構的過程。他的「破惡聲」的態勢是非常強的，若沒有一種主體性的確立，鬥爭、批判、介入都無從談起。我們在這些文本中可以看到拜倫的浪漫、尼采的超人、卡萊爾的英雄、施蒂納的唯一者、叔本華的精神、基爾凱廓爾的孤獨個人，以及莊子的那種超然物外的自由。即便是否定，也是以一種自我擴張的姿態呈現的。但在他寫作《吶喊》的時候，這個情緒完全消失了。換句話說，他的寫作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氛圍裏完成的。寫作的動力並不

來自 1907-1908 年的那個激烈否定的主體或自我。「吶喊」源自某種主體沉沒的狀態，即魯迅所說的「寂寞」。

為甚麼要讀《吶喊·自序》這個文本？我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理解魯迅的文學是從哪裏來的，魯迅的文學根源是從哪裏產生出來的。民國初年，魯迅有過一段興奮時期。他後來跟許廣平兩地通信，說到民元時候有一點希望，就是對民國的希望，但他提及這個希望的時候，已經是幻滅之時。他在信中說：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甚麼甚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¹

與其說是革命，毋寧說是幻滅，構成了《吶喊》、《彷徨》的調子。這兩部小說集描寫的是辛亥革命前後